

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比较

张建成, 李艳芳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作者简介] 张建成(1958-), 男, 山西临猗人,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研究; 李艳芳(1977-), 女, 山西临汾人,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摘要] 战后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但是法德在短短 10 多年间顺利实现了从宿敌到盟国友邦的历史性和解, 而中日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反而陷入困境。德日不同的民族心理、对待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认知以及中日之间互信与交流机制的缺失是法德和解与中日关系困境两种不同结果的原因所在。中日关系要走出困境, 必须在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扩大共同利益, 建立有效的互信和交流磋商机制, 同时继续重视民间交流。

[关键词] 法德和解; 中日关系; 比较; 化敌为友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81-06

在欧洲历史上法德可谓世仇, 且不说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上千年的敌对与厮杀, 仅从 1870 年普法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国在 70 年间先后三次大规模交战。连绵不断的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命的损失, 更使两大民族间的仇恨和猜忌雪上加霜。但是, 二战结束后短短的 10 几年间, 两国不仅成功地消除了积怨, 顺利地实现从和解、合作到双赢的过程, 而且还共同担当起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反观中日两国之间, 自 1972 年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虽然没有经历大的波折, 但是也并未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实现真正的睦邻友好, 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贸易问题诸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分歧。200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两国关系不仅没有脱离“政冷经热”的怪圈, 反而遭遇重大挫折, 进入了自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寒冬期”, 双方民间的抵触情绪更是不断高涨。德法的历史性和解为改善中日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有益的启示。

—

与德法两国千年宿敌的关系不同,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数千年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 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影响, 使两国形成了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但近代以来,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曾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也给两国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战后, 两国的仁人志士痛定思痛, 都做出了理智的总结, “中日不再战”的口号深入人心。从 1972 年中日签订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30 年来, 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友好到摩擦再到对立的过程。

最初的 10 年是友好与合作的 10 年。这一时期, 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双方的最大利益与合作的战略基础。其次, 当时日本政界大多数人对侵华战争抱有很强的负罪感, 对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的力

量在日本社会中居于绝对主流地位。三是贸易上相互需求。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日本的援助和投资,而外向型经济的日本也需要开拓中国市场,双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从1982到1992年,是摩擦与合作并存的10年。随着冷战结束,共同反苏的战略合作基础消失。日本政界新老交替步伐加快,一大批新生代政治家陆续步入政坛。这批人对侵华战争基本上没有老一代政治家的负罪感,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力量遭到削弱,围绕中日历史问题出现了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一系列有负面影响的事件。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双方时有摩擦。这些因素造成了中日关系在冷战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停滞,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从1992年到2002年,是对立与合作的10年。这期间两国发展反差很大。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恰恰是泡沫经济崩溃的时代。此时,日本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双方的摩擦表现在各个方面,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存在对立,安全领域也存在摩擦。

近两年来,日本政府采取了诸多不利于双边关系的行动:如大肆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在《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表示中国是安全的威胁;要求欧盟不解除对华武器出口禁令;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执意允许李登辉访日;制定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的西南群岛“有事”应对方针;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妄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将日本右翼政治团体设在钓鱼岛的灯塔作为日本国家财产予以保护;与美国发表共同声明,将台湾问题列为共同安全目标。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顽固坚持第五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首脑互访中断4年多之后,两国领导人政治对话也遭受影响,两国关系进入了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寒冬期”。

二

战后的中日关系与德法关系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如二战中都是敌对国,也是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都是地区大国,在区域中有较大影响力;中日是邻国,德法也是邻国,都面临安全困境的问题;在战后新形势下,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和解或和好政策来改善与原来被侵略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与德法成功实现彻底和解不同,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分歧,表现出“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特点,甚至陷入困境。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中日两国还远未实现真正的、历史性的和解。

(一)历史问题在德法和解和中日关系中所发挥的效用不同

从德法和解的过程来看,德国对侵略历史深刻的反省谢罪和真诚的忏悔行动贯穿始终,各党各派观点一致,历届政府态度如一,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成为社会的主流并不断深化。为防止法西斯悲剧重演,德国政府对公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历史教育,目的是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下一代了解到“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以及法西斯的残暴统治”^[1](第3页)。同时,德国还主动承担战争责任,向战争受害者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补偿。正是由于德国采取了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才减少乃至消除了被侵略国家对其重新崛起的疑惧,得以同昔日宿敌实现和解,同时也为重返国际舞台、提高国际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德国相比,日本在战后处理侵略战争问题上显得十分勉强和敷衍了事。迄今,日本还没有哪一位政府首脑或有影响的政治家有类似勃兰特那样表示赎罪和忏悔的举措。相反,却一再出现政治家的“失言”,否定侵略战争,美化军国主义历史,散布“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侵略有理”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等言论。从中曾根康弘到小泉纯一郎,日本有多位官员参拜过靖国神社,而且都选择8月15日为参拜日,它不仅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所持有的立场,而且助长和迎合了日本国内妄图否定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翻案的一股思潮。日本政府始终不肯以历史真相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国民,多次修改历史教科书。在赔偿问题、从军“慰安妇”、遗留化学武器、强征劳工等战争遗留问题上,日本政府行动迟缓,态度消极。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否定、歪曲、甚至美化,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也是日本与中国以及亚洲邻国关系最重要的症结。

(二)德日两国对共同利益的认知不同

德法和解是同西欧一体化过程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德法和解是在当时国家衰落、美苏冷战的历史背景下为实现国家利益而被迫做出的选择,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德法充分认识到一体化是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抉择,代表了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只有融入这个潮流,才能够互惠互利,实现双赢;法德作为欧洲大国,只有合作才能够推动一体化的顺利发展。正是在确认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德法两国的关系有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出现分歧和矛盾,双方也都愿意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在合作的框架内解决问题。战后几十年里,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两国始终能够立足战略高度,不断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积极因素和动力,西欧一体化发展到欧盟再到欧盟东扩,双方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并取得一系列成果,成为区域联合成功的光辉典范。

中日复交30余年来,两国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巨大成果。经济上,两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在投资、贸易、环保、能源等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使得日本对亚洲外交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在地区问题上,东亚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经济一体化和建立自由贸易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和日本作为这一地区拥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有责任共同推动这一进程。同时,解决区域内日益猖獗的三股势力的威胁,以及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跨国犯罪、毒品走私等严重威胁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离不开中日两国的携手合作。但是,遗憾的是,日本无视这些巨大成果和共同利益,固守“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鼓吹“中国威胁论”,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越来越明显。为限制中国在东亚起主导作用,日本明确把自己的外交战略确定为“联美制华”,即依赖美日同盟牵制中国的强大。日本东南亚关系问题专家白石隆等有关加强日—东盟关系的理由之一,便是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战略,日本对华态度强硬,两国间不仅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出现。当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仍处于寒流的冲击中,影响了双方合作的深化,不仅拖累了东亚合作的进程,而且给东亚地区的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三)德日不同的民族信仰和传统文化

法德都是信仰新教的国家,“罪感文化”认为人生而负有“原罪”,强调与上帝的对话及不断地自我忏悔。因此,德国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来自人的内心而不是外部世界。德国民族性格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德意志的彻底性,即做任何事情都非常彻底。当18、19世纪还没有接受人道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思想洗礼的时候,其彻底性表现在对领袖的盲目尊崇,对秩序的狂热追寻等,这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但是战后一旦醒悟,同时在美国指导下建立了西方的民主体制以后,德意志民族这种原来的彻底性,也是曾经导致反犹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一下子就转为对反省和梳理历史的彻底性。所有的德国人包括学术界、思想界以及媒体在经历民族心理的隐痛后都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同时,欧洲久远的和平思想与理想主义依然有着广泛的生存空间,加之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对和平的企盼以及对生命的珍视,这一切都使得法德人民在短短几十年间以理性的思考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超脱。

日本民族主要信仰神道。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是神道的基本要求和主张。对神道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照天皇的意愿所作所为是没有错误和悔罪可言的。同时,日本的“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3](第154页),日本人普遍以“认罪”、“谢罪”为耻辱。相对孤立的岛国环境造成包括日本政要在内的日本人视野狭窄和以日本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虽然向西方学习,但自由、民主思想始终难以融入日本文化。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进程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狂妄自大又极端自卑的矛盾心理,在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上呈现出极端对立的两面性。一方面以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为思想和文化渊源,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主张日本是本,其他国家是末,它与武士道文化中的“尚武”、“杀”等思想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亚洲邻国侵略战争的精神凭持。另一方面,日本对权力又有着很浓厚的服从心理,对强于自己的欧美国家实行外交追随,迁就并努力赶超,并积极致力干“脱亚入欧”。

(四)中日之间安全互信和交流机制的缺失

重视机制建设是德法实现和解的重要原因。从1963年《法德友好合作条约》开始直至后来的一体化进程中,德法的结盟关系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多层次、多领域、强制性的政治磋商、协调、决策和运行机制。这种强制性机制使双方得以及时沟通、化解可能出现的分歧和冲突,并不断推出适应新形势的合作机制,从而保证两国和解、合作大局不致因首脑易人、政府更迭而波动。煤钢共同体的建立突破了安全困境,实现了双方互信的第一步。德国政府还认识到,两国的和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只有实现了整个社会民众之间的理解和和解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解。因此,除了政府合作外,德法之间还有广泛的市民层面的合作,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如联合会、青年工作组、大学以及多个友谊城市为加强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德法两国在各个阶层间都实现了彻底的和解,培养起高度的认同和互信,为两国的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中日来说,无论是与其他领域的交流相比,还是与其他大国相比,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和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同时由于彼此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异,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尽相同,加上日本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的渲染和炒作,导致两国间原有的猜忌和怀疑逐渐上升,彼此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存在疑虑,致使国民的感情受到伤害,影响了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2005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更加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有日本媒体指出,民众对中韩好感急速下降的最大原因在于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等国反击,中韩的反应又反过来招致日本国民对两国好感下滑。这种情况是最让人忧虑的。因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不能寄希望于某些日本政客的,而只能是日本的民众。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认为:“中日关系绝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在作祟,现实矛盾有扩大和加深的趋势。发展下去,中日友好有可能进一步‘空洞化’。”^[3](第12页)

三

中日之间矛盾的客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发展中日关系很难,但又决不能困难而退。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中日关系对两国而言,目前都是重要而不可欠缺的”,“不管发生多少冲突,仍要构筑出一个不损害友好协助关系的基础”^[4](第311页)。因此,中日双方都应理性地思考,怎样才能使中日关系摆脱目前困境,实现合作与双赢。

(一)正确地认识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且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中日关系的发展史表明,历史问题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凡是历史问题处理得好的时期,中日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则停滞甚至面临困境。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低谷,完全是日本一手造成的。日本政府因坚持错误历史观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越来越引起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东亚邻国的忧虑和警惕,不仅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也使得自己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小泉外交面临的四面楚歌、日本在“入常”问题上遇到的强大阻力正是日本不正视历史的必然结果,这与日本的“政治大国”“正常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要想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理解与认可,日本必须首先拿出诚意,以德国为鉴,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所体现的原则精神,正确反省侵略历史、改变“以邻为壑”的政策,抛弃“强邻必是劲敌”的旧思维,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遇事多考虑对方国民的感情,从大局着想,为消除疑虑、增加互信、创造良好的社会和舆论环境。这样不仅符合当今国际潮流,而且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而中国方面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和对立由来已久,其实质是历史观之争,它是政治立场问题,更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因此,解决这类问题需要积以时日,潜移默化。日本少数右翼分子绝不可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幡然醒悟,关键是做大多数日本国民和主流政治家的工作,要树立“共同发展,争取双赢”的观念,通过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压缩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兴风作浪的空间。其次,鉴于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应该做进一步的工作,法德两

国历史性和解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也可以组织专家集团,相互提供尽可能客观的资料,对具体问题能够进行能够说服两国国民的事实性分析,提出共同的历史解释,最终达到中日双方具有“共同的历史认识”^[5](第177页)。另外,尽管战争结束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我们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罪行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全面和深入的调查,许多资料还有待进一步详尽和完善,随着受害者和亲历者谢世,搜集、整理日军侵华罪证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在多边体系中创建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识,在建立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促进双边关系的新发展

从欧盟的经验来看,在建立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往往都是由实力较强的国家发挥主导作用。东亚区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作为该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在区域多边合作框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既有共同利益,又有许多共识,因此,这是目前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最为主要的因素。目前东亚各经济体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时的水平,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已经具备。在中日韩分别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中日韩之间能否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进一步与东盟整合为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和东盟秘书处统计的数据,按2002年各国GDP总值计算,中日韩三国GDP占东亚13个经济体总量的91.2%,其中中日两国占了东亚的84.5%。很显然,东亚合作应当以中日为核心,正如欧盟以德法为核心一样。只要中日双方都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本着互惠互利的精神,共同推动“10+3”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那么,“10+3”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乃至达成。未来一二十年,中日可以共同倡议建立东亚能源合作机构、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会议、东北亚国际论坛等机构,不断拓宽中日合作的空间。中日两国能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双引擎”,为东亚经济合作增添新的动力;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本身也将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三)亟待解决相互信任问题,构筑互信机制,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应该看到,中日双方谁也不能吃掉谁,谁也不能压倒谁。事实一再证明,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共赢的安全利益之上,单方面的绝对的安全不能带来真正和持久的和平。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的同时,必须尊重别国的利益,关注别国的安全关切,为对方的安全创造条件。因此,中日两国必须放弃“你得我失”的“零和”思维,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超越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合作促进安全。首先,两国都要调整心态。日本不要把中国国力的增强视为对自己的威胁,只要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是决不会把日本视为敌人而处处加以掣肘的。同时,中国人也要摆脱百年来由于饱受列强凌辱而产生的“悲情意识”,用一种更自信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其次,要努力建立一种可控机制,加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目前,中日之间主要就是互信严重不足,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当然难以接受。与双边安全合作相比,多边合作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针对特定对象,强调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成员国间的误解和分歧,从而淡化通过武力解决分歧的崇尚,有效地缓解和消除各国之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因此,中日两国必须努力在东亚地区建立多边的安全框架和机制。

(四)拓展民间交流渠道,让中日友好深入人心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和长期的民间交流传统。战后50余年来,民间交流为中日复交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在当前中日关系处于重大转折时期,民间交流必将继续起到任何官方或其他渠道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双方政府要把民间交流置于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位置,在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为进一步活跃民间交流提供更加宽松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其次,民间双方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新的举措和形式,把中日友好广泛、深入、持久地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第三,重视文化交流上,文化交流的重点应放在青少年上。在日本,老年人对中国感情好的多,中年人对华态度不好的多,青年人对华情感不确定。改变成年人的观念是困难的,要重点加强中日青年人的文化交流,使下一代建立起友好关系,为中日的长久发展奠定牢固社会基础。最后,对于两国关系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矛盾

和摩擦,民间力量要从大局出发,避免过激行为,确保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目前,两国政治关系的持续冷淡正在导致经济关系也开始趋于冷淡,这种状况不符合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潮流,也与两国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德法两国这一对世仇尚且可以实现历史性和解,中日两国没有理由要把战争所造成的隔阂、对立和分歧继续下去。只要两国的政治家和广大人民顺应历史潮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把握两国关系,互为“怨邻”的历史终将会画上句号。

[参 考 文 献]

- [1] 刘作奎,张 伟.法德化解百年恩仇[N].环球时报,2003-10-30.
-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彭 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3] 刘江永.最重要且紧迫的外交课题——当前的中日政治经济关系[J].国际贸易,2005,(4).
- [4] [日]小岛朋之.90年代的日本关系:相互认识的过程变迁[C].李 玉.21世纪中国与日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5] [日]天儿慧.对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建议[C].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桂 莉)

Comparison between France-Germany Relations and Sino-Japan Relations

ZHANG Jiancheng LI Yanfa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China)

Biographies: ZHANG Jiancheng (1958-),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 Yanfang (1977-), female, Graduate,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bstract: The postwar Sino-Japan relations and the France-Germany relations has the very important similarity. France and Germany have successfully gone through a process from confrontation to reconciliation in the short more than 10 years after WW II. However, China and Japan not only did not have realized true reconciliation, instead, both countries' relations suffer the significant setback. The reason lies in Japanese incorrect handling of history issues, not realizing its common interests with China and the fact that the lack of mutual trust and exchange mechanism. In order to go out the difficult position, China and Japan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as well as establishes the effective mutual confidence and consultation mechanism on the base of Japan's correct treatment with history issues, at the same time two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s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France and Germany's reconciliati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ompare with; convert an enemy into a friend